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丁景唐 瞿光熙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增订本)

丁景唐 瞿光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6 字数 240,000

1961年7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3版 1981年1月第4次印刷

印数: 4,001—10,700册

书号: 10078·1742 定价: 1.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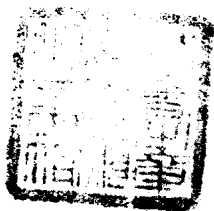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时

我们谨以此书初版本纪念
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
五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

☆

一九八一年时

我们谨以此书增订本纪念
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
五烈士英勇就义五十周年！



DE 90/25

一九六一年初版本序

—

今年二月七日，是林育南、李求实（伟森）、何孟雄等二十三位烈士英勇就义的三十周年，左联五烈士就是这二十三位烈士中的五人。

二十三位烈士是在三十年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秘密枪杀或活埋于上海龙华的伪警备司令部的；烈士们生前为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地工作、战斗，一直到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他们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的献身精神，他们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永远是我们战斗的、革命的中国人民的学习榜样。

正如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

……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53年5月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66—967页。

解放后，人民政府已经将二十三位烈士的遗骸从龙华前伪警备司令部旷场里挖掘出来，移葬到大场的烈士公墓，并树立了一块庄严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光彩闪烁的烈士的姓名：林育南、李求实（伟森）、何孟雄、龙大道、恽雨棠、王青士、李文、蔡博真、伍仲文、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白莽）、费达夫、汤士伦、汤士德、欧阳立安、阿刚等；还有五位烈士的姓名没有查清。

二十三位烈士中，许多都是当时党和群众团体的重要领导骨干，如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林育南烈士；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一九三一年在党中央宣传部担任负责工作的李求实烈士；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牺牲前担任江苏省委负责工作的何孟雄烈士等。至于连同参加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的李伟森（求实）烈士在内的左联五烈士之所以更为一般人所知道，则是因为他们是革命作家，写过不少为群众所熟悉、喜爱的作品；同时，更因为当时左联为了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揭露敌人残杀革命作家的暴行，以教育群众、激励斗志，设法通过报刊向国内外发布了左联五烈士就义的消息，以及鲁迅为了同样的斗争要求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追悼他们的缘故。

烈士们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从事革命工作的战斗岗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坚强意志则一，为向强大的敌人进行坚决斗争而勇往直前则一，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则一。他们的血肉之躯虽然已经牺牲在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永存！

当年龙华牢狱的墙上曾有一位革命同志题过一首纪念“二七”殉难烈士们的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正是这样：“壮士身亡志未穷”！现在，又是龙华桃花盛开、殷红一片的季节了。三十年前，烈士们牺牲的时候，中国还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时代，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了，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劳动和斗争，正在实现着和还将不断实现着千千万万在过去的艰苦奋斗的年月里牺牲了的烈士们的遗志！迎风招展的红旗，映照着龙华千树万树鲜艳似火的桃花。我们今天的劳动和斗争是先烈们过去为之奋斗一生的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而先烈们的斗争又为我们今天的斗争提供了经验和学习的榜样！

抚今追昔，干劲倍增！我们回顾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从事今天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踏实地工作，不断地前进，为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的明天创造条件！

二

左联五烈士不但是作家，而且，更重要的，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然后才是革命的作家。

左联五烈士都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工作。李伟森烈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他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参加左翼文化运动

的领导工作，在党内担任过不少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曾担任党的河南地委书记、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并且还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过负责工作；他编辑过党领导的刊物《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主持过党报《上海报》。殷夫(白莽)烈士也是很早就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从事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曾经三次被捕，但一出狱马上就恢复革命活动，而第四次被捕时英勇地献出了光辉的生命！冯铿烈士也是从事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的，参加过当时党所领导的“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会”的工作。这些同志，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实际工作。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用笔和敌人斗争、为革命服务，写了不少政治论文和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他们在紧张的战斗的间隙，工作之余，也撰写文艺杂文和文学创作来进行斗争。柔石、胡也频烈士主要是从事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创作。柔石是党的外围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编辑过左联机关刊物《萌芽》等；胡也频也担任了左联的执行委员和工农兵通信委员会主席。

左联五烈士，当他们各自在党的教育下沿着自己的生活、斗争的道路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他们所写的文艺论文、杂文和文学创作，就都是努力从各自的水平出发、自觉的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斗争武器。例如李伟森所写的《送太戈尔》、《评胡适之的“新花样”》、《“反文化侵略运动”释疑》等论文和杂文，就是为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斗争服务的；柔石的通过农村的典妻事件揭露阶级矛盾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和纪念一个牺牲了的小同志的革命长诗《血在沸》、胡也频的努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冯铿的通过

一个被雇佣的保姆出卖自己的婴孩的悲惨故事，揭露反动社会制度的《贩卖婴儿的妇人》、殷夫的为大家所熟知的并被称为红色鼓动诗的许多革命诗篇等，都是通过不同的题材、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一九三〇年五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柔石、胡也频、冯铿三人都出席了大会，此后，他们以革命的激情，迅速地写出了反映在会上听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柔石写了《一个伟大的印象》，用刘志清笔名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机关刊物《世界文化》创刊号上；胡也频写了《同居》；冯铿写了《红的日记》和《小阿强》。《小阿强》发表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出版的《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上；《同居》和《红的日记》在烈士生前都未能发表，在他们英勇就义之后，才由左联作为烈士的遗作发表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第一卷第一期上。尽管这些作品还有某些缺点，但它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宣传了革命的武装斗争思想、介绍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幸福的新生活，成为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几篇反映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文学作品，却是应当珍视的。

烈士们面对着当时极端凶恶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敌人，敢于藐视这个表面上强大的敌人，并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学创作，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正因为烈士们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次才是革命作家，因此他们才能用自己的笔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我们从左联五烈士身上看到了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榜样！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作家相统一的特色，不仅可以在左联五烈士身上看到，并且也可以从左联时期的许多革命作家身上看到。当时的在党领导下形成的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一支革命作家的队伍中，尽管各人的思想水平、生活道路各不相同，但这个共同特色却很清楚。这是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我们研究左联五烈士，正是要从他们身上接受左翼文艺运动的这个优良的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辉的革命传统。

左联五烈士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变化的历程。党的教育和他们的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实际革命斗争，使他们的思想不断得到改造、得到发展；同时，这个改造和发展的思想变化历程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烈士们从不同的出身、经历和不同的战斗岗位走上为人类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战斗队伍的光辉行列。他们中间，李伟森、冯铿、殷夫三位烈士是以主要精力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的，同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也用笔作武器，写了一些作品。其间，又有不同的情况。李伟森烈士写的大都是文化批判、思想斗争的论文、杂文。冯铿、殷夫烈士早期就爱好文艺，在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之前，也写过一些文艺作品，由于当时的思想水平的限制，那些作品在反帝反封建的总倾向中也带有比较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参加革命以后，他们就愈来愈自觉的把个人爱好和革命斗争统一起来，用笔来参与战斗。柔石、胡也频从事文学工作的时期较久，在参加革命实际斗争以前就已经进行了许多文学活动。这个时期中，由于党的教育、影响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也不断地发展着，正是这种发展，决定了他们后来的终于自觉的投入了革命斗争，逐步成长为无产阶

级队伍的优秀的文艺战士。这个发展过程也反映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我们在这里不想对这一问题作详尽的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如果我们能按照写作的年月顺序来考察五烈士的全部作品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文艺作品中都贯串了一条在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上逐步发展的红线；如果我们再把这些作品对照了五烈士的生平及其斗争活动来看的话，又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教育和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给他们带来的世界观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要准确地评价五烈士的文艺创作，就必须了解五烈士的全人，特别是了解五烈士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进行的斗争活动；就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地分析研究他们的全部作品并找出思想发展的脉络。当然，这种对于他们生平和创作的分析论述又要和当时历史环境、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密切结合着来进行。

三

在旧时代里，革命作家们遭到反动统治的重重压迫，以至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们的作品在那些黑暗年月中也横遭摧残、查禁、销毁。鲁迅所写的纪念五烈士的“七律”中“吟罢低眉无写处”一句，最能传达出这种对阶级敌人杀害革命作家、摧残革命文化罪行的愤慨的激情；但是，“石在，火种不灭！”即使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人们也终于透过层层黑暗封锁曲折地表达了对于烈士的景仰，写出一些纪念烈士的文章，进行了纪念活动，抗议敌人的卑劣残暴，歌颂烈士的光辉事迹，鼓舞了继起者的斗志。

解放以后，纪念和研究左联五烈士的文章日渐增多起来，一

些现代文学史中，有意识地加强了关于五烈士作品分析的篇幅。这些，说明了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对先烈的景仰，又反映了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正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事物是发展的，文学研究工作也是发展的，我们也感到，在一些有关研究五烈士的文章和著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和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一个是对于左联五烈士的估价问题。如我们前面所述，左联五烈士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才是革命作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作家相统一的这个特色，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在一些有关的文章和著作里，这个问题却论述得比较含糊，在某些文章和著作中，仅仅把他们作为一个文学作家来论述，这就低估了左联五烈士。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再一个是对于左联五烈士的作品的估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又有着一些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对左联五烈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时所写的革命作品评价过低，看不到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萌芽，低估了这个伟大的新生事物；如前所述，左联五烈士后期的一些作品，积极地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地描绘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在党领导下的斗争生活。这些作品，尽管还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始阶段所不可避免的粗糙的缺点，尽管还带着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的痕迹，某些“左”的幼稚病，但是他们这种敢于同自己过去文学作品中经常描绘的题材决裂、敢于突破旧传统而为现代文学史闯开一片崭新的领域的独创精神，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价的。另一种情况是对左联五烈士的作品一概作笼统的肯定，而没有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因而就忽视了烈士们生前的艰巨复杂的思想改造过程和他们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发展的关系。如前所述，烈士们大体上

都经过了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了迹印,无视或忽视这个过程,就不能准确地解释作家的世界观和革命实践对创作的关系,同时也会缩小和降低了左联五烈士积极参加党所领导革命实际斗争进行自我改造的伟大精神;同时,即使是左联五烈士后期的革命作品中,有一些也还存在着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例如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作者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到莫斯科去》的《序》中作过恳切的自我批评,他说,“如果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来看待《到莫斯科去》的话,其中的“错误的地方,还是很多”。这些革命作品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早期的力作。诚如鲁迅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这一方面是时代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所有这种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对于总结经验和继承传统是极有裨益的。关于左联五烈士作品的评价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根据想当然来轻率地下判断,例如有的文章中说冯铿的《红的日记》是“自传体小说”,实际上冯铿并未到过革命根据地,她是听到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代表叙述而创作出来的。至于某些文章的作者们没有看过原作,而辗转引袭,人云亦云,甚至根据不确实的资料来下判断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这些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关于革命作家的研究、论述,是一个比较新的工作,在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点,是并不奇怪的事。不过,为了前进,为了使我们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们也要改正这些缺点。二是资料的不足。而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有鉴于左联五烈士研究工作中的上述一些情况和研究工作中资料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部《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我们在主观上是想力求提供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关于左联五烈士的斗争活动、作品、译文和有关的研究的文章等方面的比较全面的资料，提供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我们的工作岗位并不是文学研究，做这项研究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只是出于一种对于先烈的景仰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研究工作的关切。这个工作，是在几年内的业余时间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的，中间常常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其他的更为迫切的战斗任务，时续时辍，又限于见闻，可能有错误不当之处。现在趁纪念二十三位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以表达我们对烈士们的景仰和学习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的心情。我们欢迎熟悉左联五烈士的生平和斗争活动的同志们、文学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们，对这本书提出批评和补充的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补正。

在这里，我们顺便谈一谈对于文学研究资料的一些看法。做一切工作都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也不能例外。文学研究工作的调查研究，既需要对现状作实际的社会调查，也需要对文字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就文字资料的角度讲，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由于反动派的压迫、破坏和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许多资料已经散失不全了，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分散，这就给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造成了较大的困难，某些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论文中存在的资料不全、辗转因袭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形成观点的某些影响等问题，除了主观的原因外，客观上资料的不易搜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离开了大量的、翔实的、经过用正确的观点作了分析的

材料，这样的研究就会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架空的倾向，以至会影响观点、影响研究工作中的正确的论述和分析问题，例如，不掌握左联五烈士的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实际革命斗争的具体材料，就不能得出他们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才是革命作家的正确结论，这就会妨碍我们正确总结和继承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以提高和改进我们的文艺工作。因此，为着发扬文学研究工作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这个资料不足的实际困难是应该努力地加以克服的，我们在这个方面还应该做许多艰苦、踏实、细致的工作。

材料和观点是辩证的统一。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学习以正确的观点去从事收集大量资料，加以整理、分析、比较、研究，就可以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做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没有正确的观点作思想指导，即使有了大量的材料，也会分别不清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甚至连正确和错误也会混淆难辨。

这几年来，各有关方面对于整理、编选、提供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工作是愈来愈重视了，工作也逐渐走向系统化了，出版了不少对研究工作有益的现代文学研究资料。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现象，对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展百家争鸣是很有益处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随着有关单位的更好的协作和全面的安排，在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资料和深入地研究现代文学历史的工作上，将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一九六一年二月——三月

一九八一年增订本序

一九八〇年三月，在我国首都北京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胡乔木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左翼文艺、文化运动，认为左翼文艺、左翼文化运动的五十年，是胜利发展的五十年，是光荣伟大的五十年，是值得热烈庆祝的。他说：

关于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已经作过热情洋溢的崇高的评价。我认为这个评价今天仍然完全适用，不需要再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在六十年代，林彪、江青之流，曾经企图推翻这个评价。他们曾经迫害了一切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左翼文化有关的人，同时也迫害了全国的革命人民。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打倒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左翼文化，也没有能够打倒中国的革命人民，他们自己却被打倒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它说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功绩是打不倒的。它是中国革命文化先驱用血肉筑成的纪念碑，它与中国人民结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关于左翼文艺和左翼文化运动，我党中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早有肯定评价。二十年前，在纪念左联五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正是根据党中央决议精神和毛泽

东同志的有关指示，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景仰的心情，编印了《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一书。尽管编者当时尽了微薄的心力，毕竟由于水平和条件所限，仍有不够完善之处；只是由于革命先烈的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因而它受到了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书中的研究资料被广泛地引用，并被翻印复制出版。这是编辑者、出版者深感荣幸和欣慰的事。

然而，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十年中，本书也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被诬陷为宣扬“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黑书”，编辑者和出版者都因此而成为推行“文艺黑线”的“罪人”。编者之一的瞿光熙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之下，终于含冤而死；他长期费尽心血收集、保藏的国内罕有的有关左翼文艺、文化运动的珍贵文献、书刊，也遭到抄毁、散失。这是使广大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深为痛惜的事情。

本书在最初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很多同志的热情支持，曾经担任过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工作的陈同生（农菲）同志便是令人难忘的一个。他曾多次同我亲切交谈，并为本书修订了《忆李伟森同志》的回忆文章。记得一九六一年春天，一位美术学院的青年学生，为了创作左联五烈士的雕塑像，曾由我三次陪同访问陈同生同志。同生同志热情接待，从烈士们的生平斗争事迹，烈士们平时的神态、性格，衣着样式，以及牢狱斗争、手铐脚镣等等，都作了具体说明。他还对雕塑的艺术构思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后来这位美术学院学生的毕业作品获得了最高考分。在十年浩劫中，陈同生同志也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毒手，被莫须有的罪名折磨、摧残致死。我们谨向同生同志致以哀悼。想起这些往事，我们又一次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限愤慨。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是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文化的

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压迫极为严重的地区。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艺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一条革命文艺战线，在敌人的心脏里，用文艺作为武器，英勇战斗，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烈士，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史上的光辉的一页。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是中国革命作家的优秀代表。他们牺牲时，都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成长道路，在斗争中锻炼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员。他们中有的是长期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而在紧张战斗的间隙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有的长期以来以主要精力从事文艺活动。在本书的初版本中，我们曾对左联五烈士的生平历史和文学上的成就，作过简要介绍。我们相信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浇灌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之花，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一定会开得更加鲜艳。他们高贵的革命品德，以及他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发扬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当本书初版本问世以后，我们就曾着手陆续收集补充资料，有的随手抄录在初版本上，有的写成了笔记，或复制了卡片。令人痛心的是，在十年浩劫之中，这些资料同遭劫难。其中有些罕见的珍贵资料，如今是再也难以觅得了！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经过拨乱反正，走上正轨。这本书也重新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近几年来，我常接到一些同志的来信或来访，谈及《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一书不易觅得。这使我已经遭到压抑的关于修订、补充本书的愿望，又重新萌发出来。光照同志已经作古，这